

觉群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 编 觉 醒

# 知识与解脱

促成宗教转依体验的藏传佛教知识论

[美] 安妮·克莱因 著

刘宇光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B946.6  
20136

觉群 佛学译丛

名誉主编 季羨林

主 编 觉 醒

阅 览

# 知识与解脱

促成宗教转依体验的藏传佛教知识论

[美] 安妮·克莱因 著

刘宇光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与解脱：促成宗教转依体验的藏传佛教知识论  
/(美)克莱因著；刘宇光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2  
(觉群佛学译丛)  
ISBN 978-7-5325-6087-5

I. ①知… II. ①克… ②刘… III. ①藏传佛教—知识论—研究 IV. ①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8758 号

本丛书由觉群编译馆主持编译  
责任编辑 罗 颢

觉群佛学译丛

## 知识与解脱：促成宗教转依体验的藏传佛教知识论

[美]安妮·克莱因 著

刘宇光 译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3  $\frac{6}{18}$  插页 5 字数 386,000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

ISBN 978-7-5325-6087-5

B·748 定价：38.00元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By Anne C. Klein

Copyright 1998 by Anne C. Klei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Horticultural Hall, 300 Massachusetts Avenue, Boston, MA 02115,  
U.S.A.,

[www.shambhala.com](http://www.shambhala.com)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year)

By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译 序

## 一、关于作者及原书

这部中译的原英文版是美籍藏传佛教哲学学者安妮·克莱因(Anne C. Klein)教授的专著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Tibetan Buddhist Epistemology in Support of Transformative Religious Experience*。1986年由美国纽约的藏传佛学出版机构雪狮出版社(Snow Lion Publications)出版发行。原书是克莱因教授据1981年她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宗教学研究所的博士论文《心智与解脱:西藏的经量部宗义》(*Mind and Liberation: The Sautrāntika Tenet System in Tibet*)改写而成。该论文后来分拆为两部书出版。本中译原属论文第一部分,据十八世纪格鲁派的两位著名藏族及蒙古族哲学家,即甘肃拉卜楞寺创立者一世嘉木样·协巴('jam dbyangs bzhad pa, 1648—1721)及青海塔尔寺和北京雍和宫创立者三世章嘉·若白多杰(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1717—1786)的经量部相关论著,对佛教量论所作的系统阐释。该论文的第二部分则是上述二人著作的英译节录,在1991年同样由雪狮出版社出版发行,题名为《认知、命名与否定:藏传经量部资料选集》(*Knowing, Naming & Negation: A Sourcebook on Tibetan Sautrāntika*)。二书算是互相支持的姐妹作,一共约六百页。克莱因的指导教授是当代西方藏传佛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他是维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研究所藏传佛学计划的创立者。该所是当代西方佛学界维吉尼亚学派的所在地,以对藏传佛学的全面研究见称,尤其擅长于格鲁派的显教,本书是这一取向下的一项成果。该所的学风不仅对藏文的读、听、讲能力作严格要求,且长期与藏族各派学僧有固定而紧密的教、研合作,为已达百年历史的西方藏学确立新典范。

本书作者克莱因教授毕业后,先后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



sity)宗教学研究所以及美国德州侯斯顿市赖斯大学(Rice University)宗教学系,现为该系系主任。克莱因教授长期随侨居印度及尼泊尔的格鲁派及宁玛派藏族学僧学习。除上述二书外,她还出版宗喀巴《入中论善显密意疏》(*dbu ma la 'jug pa'i rgya cher bshad pa dgongs pa rab gsal*)藏-英选译及阐释的专书《入中道:西藏的口传中观哲学》(*Path to the Middle: Oral Madhyamika Philosophy in Tibet*, SUNY 1994),以及讨论佛教与女性主义的论文集《遇上胜鬘夫人:佛弟子、女性主义者及其自我技术》(*Meeting the Great Bliss Queen: Buddhists, Feminists and the Art of the Self*)。另刊有佛学相关论文多篇,近年转向研究宁玛派大圆满法及西藏苯教。

本书主题是“量论”,此一课题在东亚佛教中虽甚为陌生,但在整体佛教哲学内,若欠缺之则必属缺憾。更重要的是,作者所表述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十七、十八世纪阶段的特定诠释,主要是据当时的著名学者章嘉及嘉木样之观点而提出。由于量论在佛学内的角色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部分现代研究甚至否认量论在佛教哲学上的重要性及其可能的宗教意涵,使量论与佛学之间出现裂痕。而本书的特色正在于能够系统地阐述格鲁派的经量部哲学,并专就它与中观宗义之间的哲学及解脱论联系作出说明,充分交代格鲁派对“量论角色”此一佛教哲学史上未解之谜的观点。同时相对于动辄以所谓“不可思议、不可说、吊诡、诡譎、非分别说”等神秘主义式词汇作表述的做法,格鲁派据量论为架构所展示的“经院佛学”立场,致力于示范智性在佛教宗教践行历程及宗教高峰经验中,借助名言与概念所起积极而主动的关键作用,一扫矇昧的迷雾。

## 二、译例说明

### (一) 译语

由于佛学概念的汉译不少已有学界公认采用的古译法,故尽管依英译再转译为我们更熟悉的现代汉语似较浅白易明,但考虑到有关术语已有定译,如另作新译恐徒增混乱,尤其佛学术语多各有其专门意义,即使以日常现代汉语重译,表面上也许易于阅读,实际上反而可能造成依文解义,所以决定大体沿用文言的古汉语翻译,既便于与古汉语佛典对照,亦保持与现代汉语的距离,以强调其在



佛教的特殊意思。当然,鉴于以上顾虑而沿用古汉译术语时,又反过来造成另一种困难:在一个本已冗长的欧化白话汉语句子里,不单夹杂着梵文佛教术语的文言汉译,且此等术语在原梵文及藏文佛典中可应脉络需要,容许同一词汇或为名词或为动词而无碍文法及句义,但在汉语中则既显生硬,又语义不明。故为兼顾必须的起码畅顺,译文会因应上下文而用不同译语翻译同一个词汇,以减轻阅读的困难,较常遇到的例子有:

原梵文	名词(沿用古汉译)	动词(白话重译)
例一:pratyaksa	现量	直接地认知
例二: anumāna	比量	推论地认知
例三: pratisedha	遮遣	否定
例四: pramāna	量	觉知/认知
例五: kalpanā	分别	概念地思维

除此以外,一些术语与其他词汇连用时,沿用其古汉译并无不便,但在单独使用时则与汉语的白话句子文气难相调顺,所以唯有另作他译,内文经常遇上的例子有:

原梵文	合成词例子	古汉译单字词	重译单字
例一: dharma	常住法、无常法等	法	事物
例二: visaya	所现境、所取境等	境	对象

## (二) 原文梵、藏佛学术语

由于西方学者的梵、藏佛学术语英译人言人殊,并无定译,为免行文冗长,干扰阅读,故决定译文中凡专门术语首次出现,皆附上该辞的梵、藏文拉丁字母转写,以保证译语的精确性,但省却英译不列,以免臃肿。若读者需要知道英译,则可核对书末的术语四文对照表。

## (三) 藏文特有佛学术语之中译

由于藏族及蒙古族学问僧运用藏文发明出大量梵文所无的量论新术语,自然亦没有现成古汉译,中译大体据以下各词典用字再按情况稍作修改:

1. 土登尼玛、杨化群等著、编、译:《藏汉逻辑学词典》(*bod rgw tshad ma rig pa'i tshig mdzod*,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2. 《藏汉大词典》编写组：《藏汉佛学词典》(*bod rgw nang don rig pavi tshig mdzod*，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3. 张怡荪编：《藏汉大辞典》(*bod rgw tshig mdzod chen mo*，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

4. 贺文宣、窦存琦编：《藏汉对经常用合称词词典》(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7年)。

5. 林崇安编著：《基本汉藏梵英佛学术语》(台北：慧炬出版社，1995年)。

#### (四) 藏文书名中译

由于大部分藏文典籍都没有中译，所以译者尽量据以下目录书撰译有关书名：

1. 黄显铭编译，隆莲法师审订：《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本目录主要用于中译梵文典籍的藏文标题。

2. 民族图书馆编：《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三卷本的这一目录册主要收录传统蒙藏学僧以藏文所撰论著的标题及其汉译，即一般所指的“藏外文献”。

#### (五) 藏文人名中译

人名大多沿用中国大陆既成的中译，未有定译者依王贵《藏族人名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为准。人名首次出现时，除少数欠书面藏文拉丁转写(*transliteration*)而标明用音译(*phoneticize*)外，皆尽量附上藏文转写，避免音译在方言发音上的差异及方便确认身份。

#### (六) “译注”的安排

无论量论或藏传佛学对汉语佛学界而言皆属陌生，所以即使译出满眼是藏传量论术语的全文，若对有关术语不作补充说明的话，读者仍无从卒读本书。故中译者特别抽出七十个藏语量论特有术语作中译注，以期有助于读者理解。凡在有关术语首次出现时，即以例如：[译注 54]样式表明，并以“译注”为标题在全书的原“注解”后作说明。译注的数十个项目里大多属格鲁派量论术语，另少部分则包括与量论相关的学僧。而绝大部分译注将安排在前数章。

#### (七) 译注引述文献缩写表

① 《藏逻》 土登尼玛、杨化群等著、编、译《藏汉逻辑词典》(*bod rgw tshad*





*ma rig pa'i tshig mdzod*)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② 《藏佛》 《藏汉大词典》编写组,《藏汉佛学词典》(*bod rgw nang don rig pavi tshig mdzod*)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③ 《藏大》 张怡荪编《藏汉大词典》(*bod rgw mdzod chen mo*)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④ 《笔记》 《东嘎·洛桑赤列教授摄影笔记》,收于洲塔著《论拉卜楞寺的创建及其六大学院的形成》(兰州:甘肃民出版社1998年),pp. 143 - 199

⑤ 《梵和》 荻原云来编,直四郎监修《汉译对照梵和大辞典》(台北:新文丰影印1979年)

其中第④项《笔记》的原作者东嘎·洛桑赤列(*dung dkar blo bzang 'phren leg*,1927—1997)于1947年取得拉让巴·格西学位,受学于拉萨色拉寺麦巴札仓。译注内所附藏文一律只用特里尔·怀利(Turrell Wylie)的书面藏文拉丁转写(transliteration)系统,不采用任何音译(phoneticize)方式,避免三区方言在发音上的差别,藏文转写准则见T. Wylie,“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2, 1959, pp. 261 - 267。

#### (八) 注解中译的译例说明

(1) 为免注解的中译过于冗长,故此一般来说西方学者的名字、二手研究的出版资料、期刊名称等省却不译,保留英文说明,唯论文及书籍在注解内首次出现时附上标题的中译,另日本人名则还原回汉字。

(2) 梵文及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所述的印度、西藏及蒙古人名、书名、寺院名字等尽量中译,并在首次出现于注解时附上转写的标题。当中不少名称在原英文版中只用英译而不再附转写,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使用中译,不再另附梵、藏转写或英译。蒙、藏文专有名词的中译,凡已有约定俗成或正式官方中译者,一律沿用,其它人名方面,将尽量据下书音译:王贵《藏族人名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

(3) 有关梵、藏原典或现代学术研究等的出版详情(如作者、译者、论文、书名、丛书名、版本、出版时、地、机构等),读者必要时应另行查阅“参考书目”一栏。

(4) 由于译者手边欠缺藏文“藏外文献”,故在原英文版注解用于标示藏文



本出处的缩写与编号，译者为免随便中译招致不必要的误导与混乱，故把有关缩写、编号等不加改动地移到中译上。

(5) 作者克莱因教授在注解多处引述她另一部著作《认知、命名与否定》(*Knowing, Naming and Negation*, New York: Snow Lion Publ., 1991), 为免冗述, 简称 *KNN*。

## 中文版序

笔者衷心感谢刘宇光博士在翻译拙著过程中所付出的心力,同时也为拙著从此可供汉语学界的同仁与学友使用而深感荣幸与高兴。

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密切关系的章嘉·若白多杰(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是拙著的主要典据之一,所以拙著如今得以与中文学界交流,使笔者尤感雀跃。章嘉出生于今属青海省境的安多西莲花区,在他九岁时,被派到北京学习汉、蒙、满等文字,还与稍后登基的乾隆皇帝私谊深厚。若章嘉得悉他的著作在借道美国后又回归到他感同故里的土地上,无疑定会欣喜万分。

拙著所探讨的那些作品是开启繁浩佛典的关键钥匙。章嘉及发挥陈那、法称要旨的其他疏释家们都认为:在渐次成就慧观的宗教修道中,理智担任关键角色。对于那些认为宗教性的哲学多少有点落伍或有乖理性的人来说,上述的观点也许颇见陌生,故此对于抱持这种声音的人来说,拙著便更显得有其重大意义了。

大部分的经(sutra)教传统,包括尤其像格鲁派在内,皆主张理性是现证解脱慧的坦途大道,并依此立教。而拙著也是对这种立场的基本构思进行综合性的阐释。宗喀巴的大部分著作,当中包括使他闻名于世的“道次第”(lam rim)论著在内,皆坚持相同的设想。而在过去五百多年以来,以宗喀巴为最高领袖的整个格鲁派也紧守此一原则。

这种见解所以引人侧目,乃在于它认为:对我们来说,早已熟能生巧的常态理智隐然与另一类完全不同的理解能力相同。然而,难道这种观点毫无可疑之处吗?难道我们也许亦有意成就的这种智性认知真的毫无局限吗?

在撰述拙著的过程中,研究把笔者引导去探讨另一种重要而复杂的相反立场,其最极致的型态是藏传的大圆满法(rdzogs chen)。我们发现它略近似于某些禅宗,他们从根本上质询概念思维的能力与正当性,尤其质疑概念思维作为正确认知(“量”,tshad ma)实相之根据的有效性。一方面充分肯定思维的有效,另



一方面却否定之，这些见解之间的张力支配着大部分佛教哲学的论述。

事实上我们可以见到这两种立场相互之间的深刻对话贯穿整个亚洲佛教史，由半传说的桑耶“论诤”开始，到述之于《坛经》内，发生于禅宗成形历程中的著名顿渐对诤，都是一脉相承的。儒、道二家为着理清彼此的所有分歧，以认真的态度互相质询对方，并深入彼此的义理。同样地，我们在此也见到佛教内部论辩的双方都在悉力丰富一己对对方意义的欣赏。它确实是佛教慧解深处的一个重要议题。故此，笔者热切期望刘宇光博士能在汉语学界的同仁中结合志同道合者，并肩成就中译宏伟浩瀚的藏传佛学之宏愿。

我们皆以研究佛教思想为志业，期待能从汉语学界对如此丰硕的藏传文献所作的研究与剖析中互得学益。

安妮·克莱因

2005年7月25日

于德克萨斯州 候斯顿市

## 谢 辞

笔者是在1976年随拉谛(Lati)教授师研读与拙作密切相关的材料,当时他即将被委任为南印度蒙戈德(Mundgod)甘丹学问寺夏孜(Shardzay)札仓的堪布。他1923年出生于藏东康(Kham)区,并在拉萨附近的甘丹寺受教育。在这位才华横溢而严谨的学者指导下,笔者研习普觉强巴(phur bu lcog, 1825—1901)的《摄类学》(*bsdus grwa*),作为我在维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部分训练,而当时拉谛教授师是该校宗教系的访问讲师。在1977年的系列个别导修中,我随拉谛教授师阅读章嘉(lcang skya, 1717—1786)《宗义书》(*Grub mtha'i rnam bzhag*)的《经量部章》,并稍后在1978年跟随时任维吉尼亚访问讲师的丹玛洛卓(音译:Denma Loch)教授师再作研读。洛卓教授师1927年生于康区的玉树(Chik undo),并在拉萨外哲蚌学问寺洛色林(Loseling)札仓受教育,他为丹达拉让巴(bstan dar lha rams pa)的《自相法与共相法讲解》(*Rang mtshan spyi mts-han gyi rnam gzhag*)<sup>①</sup>作注。在1979年上半年,笔者随已故格西·更敦洛卓(音译:Geshe Gedun Lodr)阅读及讨论嘉木样(一世, 'jam dbyangs bzhad pa, 1648—1721)《宗义广释》(*Grub mtha'chen mo*)的《经量部章》,那是格鲁派对经量部的最详尽分析。他在哲蚌学问寺的郭莽(Gomang)札仓受教育,曾任汉堡大学(University of Hamburg)副教授。这位异常博学的聪颖学者在1979年下半年以五十五岁的壮年早逝,是佛学界的莫大损失。

跟随这些学者学习的宝贵收获是使我能够通盘理解格鲁派所阐述之经量部(译按:以下一律简称“格鲁派经量部”);依据这幅心中的哲学地图,我才能抽出个别课题作详细探讨。所以我诚心感激的并不只限于刚才提到的学者,还包括委任他们的维吉尼亚大学南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South Asian Studies)。

① 这些原文的翻译暨他们的口注收在我的《认知、命名与否定》(*Knowing, Naming and Negation*, Snow Lion Publ., 1991.)



笔者对拙著所讨论的课题所作的第二阶段探索是在1980年。富布赖特(Fullbright)博士论文研究基金资助我到印度作一年的田野研究,并在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佛学系米塔(K. K. Mittal)教授的热心指导下展开工作。在印度的第一个月期间,我每天都与新德里藏文图书馆馆长班丹札巴(Palden Drakpa)碰头,他是一位洛色林札仓的格西,我随他第三次读章嘉的篇章。利用这个时机,笔者不仅厘清手边的文本,且深入探讨了由它所引发的系列广泛议题。格西·班丹札巴如今已五十多岁,他不但为我澄清了许多疑问,同时也指点出很多困难的领域,并鼓励我去拜访在印度南部复校的多座藏传学问寺。1980年2月,我南下来到位于卡纳塔克邦(Karnataka State)的新哲蚌寺。随后的四个半月,我很荣幸每天都能拜访哲蚌寺洛色林札仓的退任堪布——时年六十七岁的堪苏·益西土登(音译:Kensur Yeshe Thupten),他以擅长掌握最细致或最复杂的课题纲领而闻名。在这期间,也与哲蚌寺郭莽札仓的优秀学者楚臣平措(Tsultrim Puntsok)有过无数讨论,阐明了章嘉著作中诸多议题的精彩论点,他后来成为汉堡大学的教授。

1981年上半年,我打道返回美国途中,又随强巴桑培(音译:Jambel Shenpen)阅读郭莽札仓对成立法及遮法的阐释,还读了丹达拉让巴著作的多个部分。当时六十二岁的他是续部密院的退任堪布,之前在甘丹寺的绛孜(Jangdzay)札仓修学。后来在1984年,受命出任“甘丹赤巴”(dgav ldan khri pa),即宗喀巴的第九十八任继承者。他那充满色彩的疏释,生动活泼地展现了这些文本内的许多重要议题。

在笔者与这些学者们的合作过程中,会询问并录下他们对文本的疏解,然后以此为起步点详析关键课题,这种探索常引领我们扩及其他注释家们甚或溯至印度源头。接着我会细听这些录音,译出内容,并做摘要。通过多位教内人士的耐心雅正,笔者逐渐熟悉深富脉络意义的详尽内容,而这都是单纯透过文本分析所不可能得到的。

再者,我从维吉尼亚大学佛学研究的创始者与领导者杰弗里·霍普金斯(Jeffery Hopkins)教授处获益良多,他毫不吝惜地通读拙著初稿多次。凭着他对于藏文哲学论典的广泛阅读,他的讨论引领我穿透无数篇章内的课题,并凝集其重要性。维吉尼亚奥尔德曼图书馆(Alderman Library)的藏文主管及南亚目录编



## 谢辞

辑斯基普·马丁 (Skip Martin) 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我也很感谢在论文撰写阶段, 维吉尼亚大学里其他导师的慧见, 他们是理查德·巴尼特 (Richard Barnett)、保罗·格罗纳 (Paul Groner) 及大卫·利特尔 (David Little) 三位教授。再者, 在亚洲时, 我与以下三位学者的交流与热烈讨论也让我受益不浅, 他们分别是近来取得格西学位的首位西方人桑杰桑珠 (音译: Sangyay Samdrup) 法师 (译按: 即 Georges B. J. Dreyfus)、在印度的格鲁派诸寺学习逾十年的前辈丹尼尔·科夫曼 (Daniel Coffman), 及在加德满都尼泊尔研究中心 (Nepal Research Center) 的范德康 (Leonard van der Kuijp) 博士。

笔者也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的永富正利 (Masatoshi Nagatomi) 教授。当我以访问学人的身份于哈佛世界宗教研究中心 (Harvard'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 着手修改初稿时, 永富教授慷慨地在有限时间内尽心通读拙著的数章。尤其难得的是能向他请教与拙著课题相关的印度文献及背景脉络, 特别当遇上他的拿手专长, 即陈那和法称的著作时更是如此。毋庸多说的是, 在上述众多老师指导下, 内容若仍有任何缺漏, 笔者当负全责。

笔者也应感激外子哈维·阿伦森 (Harvey B. Aronson) 教授, 他以直率的慧见及不懈的思索伴我在印度各地的公共汽车及茶座上钻透各种难缠的议题, 全力支持我完成这个研究; 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双亲克莱因 (Klein) 伉俪: 卢多维克 (Ludovic) 及依莎贝拉 (Isabelle) 的慈爱关怀, 及格西·旺杰 (Geshe Wangyal) 的深刻感召。

## 总 序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的。影响所及，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19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C. R. 莱曼等创办《哈佛东方丛书》、奠定美国佛教研究基础以来，从地域上说，其研究范围已囊括南传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东亚佛教，举凡教理、经典、仪式、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成果斐然。目前已发展至巴利文、梵文及藏文，横跨文献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宗教学界已呈后来居上之势。就佛法源流而言，佛教从印度本土向南、北方向分别传播，菩萨高僧，筌路蓝缕，而成北传大乘、南传上座二极，于今因缘增上，不断发展，已趋于世界佛法之域，可谓千载一时也欤！

因此之故，时有台湾蓝吉富氏主编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一百册，介绍国际佛教学术界之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等，内容广泛，对于国内学界





知识与解脱：促成宗教转依体验的藏传佛教知识论

拓展学术视野，提升佛学研究水准，甚有裨益，可喜可贺！惜其著作多属近代，且以日文为主，时过境迁，欧美近代以后之佛学研究日新月异，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将此类新知卓见译为汉语，嘉惠学林，已成迫切之势。

藉此因缘，敝寺故有觉群编译馆之设立，集思广益，斟酌权衡，适时推出《觉群佛学译丛》，实欲借古人译梵为汉之经验，取信、达、雅之准则，推陈出新，俾在家出家，两俱得益。佛法虽重在行持实证，佛经所说理趣，亦无不求证生死大事之门径，若依文解义，理事分途，则徒成慧业，殊失佛法之宗旨。然此乃针对僧伽悟道而言，非指俗世传教之事，况时际浊世，佛法传扬端赖因缘，适应时会，则日以广信，僧伽寄质尘寰，岂可遗世而独立者乎！

倘参以此译丛为契机，重视我国古代传译之汉文圣典，探悉诸宗玄义，同时摄取世界各地佛法之优长，融贯现代国际佛学界之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深信国内会有更好的研究成果出现，佛教亦将进一步充实与光大，余之愿也，因序之而随喜赞叹云尔！

2004年8月佛欢喜日觉醒序于般若丈室